

张希清 田 浩 黄宽重 于建设 主编

10—13世纪 中国文化的 碰撞与融合



人
文
社
科
新
论
丛
书

张希清 田 浩 黄宽重 于建设 主编

10—13世纪
中国文化的
碰撞与融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张希清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ISBN 7-208-06427-X

I. I... II. 张...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10世纪~13世纪—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792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人文社科新论丛书 ·

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张希清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9.5 插页 5 字数 479,000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427-X/K·1231

定价 43.00 元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除学术专著以外，频繁举行的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也形成了大量群体性的学术成果。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论》丛书，意在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论文集中的文章，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前　　言

10~13世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充满社会变动与更革的时期。在这400年间，中国境内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907~960年）和契丹族人建立的辽（916~1125年）、汉族人建立的两宋（960~1279年）、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1038~1227年）、女真族人建立的金（1115~1234年）、蒙古族人建立的蒙元（1206~1368年）等政权。其间既有政治上的分裂与对立，又有各地区、各民族之间各种形式的交往与沟通。既有激烈的碰撞，以至于兵戎相见，互相残杀；也有各种形式的融合，以至于元朝将宋辽金时期北方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统称为“汉人”。不同历史积淀、不同社会形态、不同生活方式下形成的异质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在痛苦中迸发出新的因子，导致中国文化的融合与更新。这是一个由统一而发生分裂，又从分裂而归于统一的历史时期。

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各个政权范围之内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涉及两个及多个政权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讨论双边或多边的关系问题。从对于更长时段的研究来看，如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唐宋变迁”、“宋元变迁”等讨论，也多着眼于中原汉族政权与前后王朝的比较，而未能将该时期的社会全貌完全纳入视野。

随着上述论题研究的日趋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社会”与“文化”，事实上是在超越政权界限的广阔场景下展开的。如果孤立地着眼于某个政权，将原本融通的历史事实人为地拆解开来，这样的研究方法势必造成种种忽略与遗漏，难以把握总体社会背景之下多侧面、多因素的活生生的互动关系，从而导致整体认识上的偏差与失误。

有鉴于此，我们设计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研究课题，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重大科研项目。我们拟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格局出发，从“碰撞与融合”这一视角着眼，对10~13世纪中国境内的不同文化的冲突、沟通与整合进行总体研究，以期对于该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获得真切的理解；并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争取对以往的相关研究层面有实质性的突破。

经过近三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2004年7月29日~8月3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召开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十多位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大会共提交了38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既有紧扣主题，以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主的讨论；也有关于辽宋夏金元史的专题研究。具体论题的丰富、研究视角的多样，敏锐的问题意识及新颖观点的提出，都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学术讨论和实地考察，学者们深切地感悟到：中国历史上的10~13世纪，是充满着创新，也充满着磨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今天对于这一时期的认识，也将是一个艰苦而充满探索的过程。只有通过广大学者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本书就是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和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书自10~13世纪的整体政治大势着眼，指出在当时，相对于

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赵宋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影响上。如《试论10~13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一文，论述了10~13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条件、复杂情况以及历史互动的统一进程与民族气节等问题，努力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脉动。

与以往研究辽宋、宋金关系者往往偏重于南北军政对立局面的做法不同，本书着重考察了双方之间长期的文化交流、商贸交通、使节往来关系，讨论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制度文化、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如《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一文，详细考察了“双陆”这种古代博戏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它源于古印度，曹魏时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至南宋时，稍显衰落。然而，在与两宋同时的辽和金以及后来的元朝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汉人中，都得到广泛的传播，反映了中国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传承。人们对“双陆”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双陆”从印度传入之初，被视为“胡戏”；隋唐五代时，已逐渐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辽、金时，则被视为汉文化的象征。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还反映了外来文化传入后，进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轨迹。经过消化和改进的“双陆”博戏，同传入时已有很大不同，并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双陆”从“胡戏”而变为与围棋、象棋等并列的博戏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及其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

本书还讨论了各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路径，以及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地方势力的因应之道及其衍生所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如《宋、金、元文化思想碰撞与融合——探究郝经的夷夏观、正

统论与道学演变》一文，以元初思想家郝经为个案，从夷夏观念、正统论与道学的演变的角度讨论宋金元文化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本书一些文章还讨论了历史上“汉化”等范畴的不断演变，注意到所谓“汉化”、“封建化”过程与各个民族“文明化”过程的联系与区别，既注意到少数民族选择汉制的主动，也注意到他们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努力。文化碰撞与融合问题具有复杂性：既看到文化“碰撞”带来的破坏与生机，也看到“融合”之后的发展与可能产生的危机。

本书的另一部分内容是在“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关于辽宋夏金元史的专题研究。其中不仅有讨论特定的政权、局部地区、个别制度的研究，也有从语言文字、考古发现、图像资料、民族审美取向及艺术趣味等方面入手的研究。就研究方法而言，有的以严密的实证考订见长，有的则运用了新的分析工具。如《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一文，对两宋的基层社会进行了长时段、多侧面的研究，论证了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基本上构成了宋代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三者彼此合作，互相依存；同时也形成某种程度的竞争与紧张关系。此一现象为后来的朝代所继承，成为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的雏形。

从“碰撞与融合”的视角，在10~13世纪这一漫长而广阔的历史发展视野中，把握辽宋夏金元之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互动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相信今后将会不断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张希清 田浩 黄宽重 邓小南

目 录

试论10~13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虞云国	1
宋、金、元文化思想碰撞与融合：探究郝经的夷夏观、正统论	
与道学演变/田 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21
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宋德金	62
辽宋科举制度比较研究/张希清	85
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邓小南	114
文化的边界——两宋与辽金之间的书禁及书籍流通/刘浦江	138
宋、辽、金、元时期庙学制度的形成与普及/成一农	164
异域的梦想——从昭君故事的传述与变异看宋人对外心态之转	
折/刘静贞	183
南宋末儒家对异族侵犯的态度——王应麟与蒙古人/苏费翔	
(Christian Soffel)	204
收养：一个不可忽略的人口与社会问题——宋元民间收养习俗	
异同初探/臧 健	223
宋代使臣语录考/刘浦江	253
宋代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苗书梅 刘秀荣	297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的演变/黄宽重	314
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陈 峰	350
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方式/李 晓	371
先帝皇后与今上生母——试论皇太后在北宋政治文化中的含	
义/赵冬梅	388
辽代的移民、治理与民族融合/武玉环	408
辽朝的选官制度与社会结构/关树东	438

辽代皇家人物画研究——以辽墓壁画为中心/张 鹏	462
契丹小字《萧特每·阔哥驸马第二夫人韩氏墓志铭》考释/刘凤翥	
清格勒	479
斡鲁朵与藩镇/高井康典行	490
儒学与佛教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李华瑞	516
金中都的历史地位/宋德金	530
从金代主事一职看边疆民族对中国官僚体系的影响/林煌达	546
金代汉族进士的官职迁转/陈昭扬	562
墓志所见金代土族女性形象——以《遗山集》墓志为重点/杨 果	
.....	596
后记	609

试论 10~13 世纪中国 境内诸政权的互动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黄仁宇认为：直到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①证诸辽宋夏金元时期，其言虽不无道理，但似乎过多强调了各民族或诸政权之间碰撞的一面，而低估了中国文化在这一时段融合的一面。当然，对于“冲突”，也可以赋予更丰富广泛的内涵，不是只从军事上的征战攻杀去把握，而大体与汤因比提出的“挑战与应战”的说法相近。但为论述简便，本文不妨称其为“互动”。

10 世纪初叶五代开始（907 年），标志着李唐王朝名义上统一的最终结束，而再次完成大一统业绩的元世祖是在 13 世纪末叶去世的（1294 年），因而 10~13 世纪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有理由作为历史考察的合适时段。

虽然传统的观点无不认为：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晚唐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建。以辩证的观点看来，分裂与统一都各有一种相对性。宋代确实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在所谓中原王朝的意义上（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仍可借用这一概念的特定涵义来指称它），消除了分裂，实现了统一。

^① 黄仁宇：《赫逊河边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 年版，第 157 页。

但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反观这一时期，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分之势，在疆域的大一统方面，不仅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而且辽、金的实控版图不比宋朝小，在与它们的军事角逐中，宋朝基本上没有占过上风。从大中国的视角看，把这一时期看作所谓“后三国”或者“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是有其理由的。

倘若把视野放宽到大中国的范围内，相对于宋朝说来，辽、金、西夏都已经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与之长期抗衡的对等的少数民族王朝（在中古时期，就政权性质、历史跨度、疆域幅员而言，似乎只有北魏与此略相仿佛。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政权大多在历史跨度和疆域幅员上条件不够；西魏、北周与五代后唐在历史跨度上仍有所欠缺；柔然、突厥则政权的稳定性大成问题）。就此而言，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分裂依旧是主流，大一统并未实现，宋朝确乎还称不上大一统的王朝。

然而，无可置疑，宋朝作为统一的中原王朝，在这一时期历史大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很显然，大一统最终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来完成的），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深远的影响上。在中华文明圈里，无论是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还是与宋朝睦邻相处的大理国，都对宋朝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自觉不自觉地表示出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只有以这种辩证的观点，才可能更准确地把握10~13世纪的历史脉动。

一、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条件

政治格局的变动，是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诸政权互动的重要条件。

辽朝的勃兴，除了契丹社会的内部原因和耶律阿保机的个人因素，与漠北草原和中原地区历史大环境的变迁也是息息相关的。一度称雄塞外统治契丹的突厥、回鹘已经风光不再，而晚唐五代之际中原政权衰微分裂，自顾不暇，都给辽太祖和契丹民族的登台亮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倘若当时蒙古草原上已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倘若当时中原王朝之强盛统一仍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时，那么，辽太祖和契丹也许也会如流星一闪，就黯然失色。

西夏党项政权的崛起，也离不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唐末五代，党项政权羽翼未丰，以藩镇身份与中原王朝维持着臣属的关系。宋初立国二十年里，忙于统一大业，利用夏州党项牵制北汉；而党项政权仍保持与宋的臣属关系，以丰满羽毛，扩张势力。这一过程与北宋统一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其后，统一的北宋王朝与夏州民族政权的矛盾便逐渐凸现，就有了李继迁的叛宋自立。西夏之所以能立国，李继迁与元昊的个人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契丹的崛起及其与北宋紧张的对峙关系，北宋军事实力因而大受牵制与削弱，不能专一对付西夏，也起了不可忽略的互动作用。可以说，西夏的长期立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先后得益于宋辽、宋金的对峙。

这一时期诸政权互动，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燕云十六州控制权的易手。在古代战争中，骑兵对于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队无疑具有绝对的优势；在军事地理上，长城对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南下则能起到防御屏障的作用；而紧挨长城南侧的燕云十六州是长城防线赖以存在的有力依托，与长城构成唇齿相依的关系。燕云十六州划归契丹，不仅使东段千余里长城防线都成为辽朝境内的摆设，而且把长城南侧可以在军事上布防的隘塞险要也一并拱手让给了辽朝。辽朝控制了长城，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就像把守了中原王朝的北大门一样，随时可以长驱深入，直捣中原腹地。其后，不仅华北平原，而且整个中

原王朝就完全敞露在北方铁骑的攻击力下，彻底处在屏障尽撤、无险可守的境地。石敬瑭割弃燕云，直接导致了宋朝在与辽的对峙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也间接导致了金朝能轻而易举地灭亡北宋，从而再度形成宋金之间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可以说，两宋三百余年的外患局面都是此举种下的果。

以往似乎多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探讨燕云十六州的得失，而实际上燕云十六州划归辽朝，对契丹来说，也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在军事地理上，这一地区成为辽朝防止中原国家长驱深入的军事屏障。其二，作为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窗口，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其三，燕云十六州的封建农业经济对契丹立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深远影响。这种封建农业经济在契丹社会经济中始终是相对独立的，与其原先的游牧经济形成良性的互补，随着年代推移已经成为辽朝赖以立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板块。一方面，它作为社会经济的先进模式，刺激和引导着头下州县乃至契丹全境的封建化进程；一方面，它作为辽朝最先进的经济区，是契丹得以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以南北朝抗衡的不可或缺的经济支柱。

同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对于中原与契丹的利弊得失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原国家失去燕云，尽管在国家安全上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却不会影响其原来的社会文明程度。而辽朝（也包括以后的金朝）一旦失去这一地区，它的经济文化形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成为类似前代突厥、柔然那样勃然而兴倏然而灭的游牧政权。可以说，倘若没有燕云十六州，契丹充其量只是北方边境的一个民族政权（北魏如果没有中原，也只是如同柔然那样的边境民族政权）。由于燕云的并入，辽朝增加了一个具有封建传统的新增块，采用原先的头下州军的办法，显然不能长久有效地统治这一地区。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统治政策的全面调整，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法律规

定和文化习俗诸方面。

实际上，不论宋辽哪一方试图控制燕云十六州，都无可非议。高粱河战败的次年，宋太宗还没有死了收复燕云的心，张齐贤有针对地说：“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事而已乎！”^①南宋有个叫吕中的学者批评张齐贤，说他只知道辽朝不可伐，却不知道燕云所在当取，理由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②前一条理由事关民族与文化问题，在当时虽是原则性的大问题，但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融合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左衽之民陷于中原，中原之民陷于左衽，都是不可避免的双向代价。后一条理由确是宋朝必取燕云的关键所在，即吕中所谓“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③更何况燕云十六州原来就是从中原国家划给契丹的，宋朝志在必得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既然双方都有取得燕云十六州的历史合理性，而双方又互不相让，便只有以战争这一军事互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结局是宋朝处于劣势，没能夺回控制权。这就构成了 10~13 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互动的框架和格局。

二、中国境内诸政权在历史互动中的复杂性

1. 中原王朝在历史互动中的主要表现

在这一时期诸政权的互动中，少数民族政权较之中原王朝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这是因为，它在这种激烈的互动中必须实现自身社会形态的多次蜕变和急剧转型，而与之互动的中原王朝却在社会形态与

^① 《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②③} 吕中：《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四。

文化制度上却始终居于先进与优势的地位。中原王朝受到的主要还是政治与军事上的冲击，这种冲击虽然不会对其社会制度产生影响，却仍会对其的基本国策产生牵连的效应。两宋社会在思想文化上的收敛性趋向，就与这种冲击不无关系。

雍熙北征是宋辽冲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太宗企图收复燕云的最后努力。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对宋朝来说，在君臣将士中间普遍滋生出一种恐辽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宋朝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把战略进攻变为战略防御，对辽一味采取守势。在对外失利的情势下，宋太宗转而把统治的重点放在对内的防范和控制上，端拱二年（989年），他赞同“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的上言，确立了宋朝一以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①由于收复燕云的无望，宋朝北大门的键钥始终掌握在辽朝的手中，不久就有澶渊之盟的订立。

就澶渊之盟来说，宋朝反击辽朝入侵的保卫战，本来就是正义的；而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以便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自雍熙战败以来，宋朝君臣上下弥漫着严重的恐辽情绪，而“守内虚外”的国策也使真宗把注意力着重放在对内防范上，因而不但不敢抓住战机，反而落得纳币求和的妥协结局，订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背上了岁币的包袱。岁币不仅自此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还在以后对西夏与对金朝的交涉中成为一种惯用的妥协方式，也直接影响到宋朝对夏、对金关系的格局。

2. 少数民族王朝对复杂民族构成与不同人文板块的应对

辽、夏、金、蒙等游牧民族政权，其建国过程与从部落联盟晚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几乎是同步的，其后又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开始了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三十，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条。

向封建制的过渡。参与并推进这一系列的社会剧变进程的，既有分别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族，也有占人口最大比重的汉族居民。作为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贵族，在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的同时，如何在民族关系上协调与汉族各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关系到这些政权能否长期在北方立国并与中原王朝形成南北对峙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类似辽朝那样具有契丹国家特色的一国两制式制度建设，在其后的西夏、西辽、金朝乃至蒙元的立国过程中也各有体现，并融入了各自的特色。

元昊颁行的西夏官制，与辽朝的南北面官制颇有相通之处，一方面采用宋制设立官职，一方面设置党项官，两个系统并行。西夏设立蕃汉二字院，汉字用于与宋往来文书，蕃书即西夏文字，用于国内以及对吐蕃、回鹘和西域诸国往来文书。

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也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国家制度上沿用了辽朝的南北面官制，不过，在南面地方官名上，西辽采用了类似八思哈这样的突厥语官名，使当地人民更易接受。在经济政策上，维持农耕和游牧的两部经济体制，在农耕地区减轻赋税以换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西辽执行开明的宗教政策，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这是符合西辽境内民族复杂、宗教多样的实际情况的。

金朝的版图可以划分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人文地区。一是原辽朝统治的东北地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等，其中契丹、渤海等族已进入封建制，而个别民族还处于比女真更落后的氏族制时代。一是原辽朝上京以南直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里辽朝立国以来已处于封建制统治下。一是原宋朝淮河秦岭以北的汉族地区，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为了统治这三色拼成的政治版图，金太宗在政治和经济上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国多制。

金太宗时，在政治上沿用辽朝南北面官制。北面官指女真旧制，